



行走在甘肃大地上

彭文鼎



行走在甘肃质朴沉静的大地上，历史的风沙扑面而来。早在旧石器时代，先民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更是遍布甘肃大地，大地湾遗址展现了中国在 8000 多年前的卓越文明成就。2000 多年前，西汉在此设四郡、开丝路，开启了一代盛世。这里曾有“阡陌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的辉煌，也有过“陇中苦耕甲于天下”的悲凉……

甘肃，在中国的版图上宛如一柄玉如意，而散落在甘肃大地上的每一个或古朴或灵秀的地名都如同镶嵌在玉如意上的明珠。甘肃的地名中有汉唐风韵、有金戈铁马，古朴中透着雄浑、灵秀中蕴含诗意，其中无数的传说和古老故事世代相传、绵延不绝。

兰州是甘肃的省会，黄河穿城而过，日夜奔流。兰州古称金城。公元前 81 年，汉昭帝始置金城郡。“金者，取其坚固也”，金城乃是军事要塞。汉廷在边疆大规模移民屯田，加固城塞，金城含固若金汤、不可攻取之意。隋文帝时，因城南有皋兰山而取“兰”字，因黄河穿城、沙州富饶而取“州”字，从此又获名兰州。兰州二字，读之令人口齿生香，让人想到《诗经》和楚辞汉赋中描绘的香草，衡兰芷若，有馥其芳。因金城之名流传久远，故而今许多人习惯称之为金城兰州，兰州灵秀、金城雄浑，二者合一却毫不违和，互为表里、参差对照间显现出一种古朴大气的美。高适在这里写下的《金城北楼》有“湍上急流声若箭，城头残月势如弓”之句，岑参也曾写下《题金城临河驿楼》一诗。

在临河驿楼上听过了黄河涛声，看过了古朴的水车和羊皮筏子，从金城兰州出发，再向西迤邐而行，在

河西走廊的东端，将与六朝古都武威相遇。

武威得名于汉武帝时期，公元前 121 年，霍去病击败匈奴，河西走廊纳入汉朝版图。为了彰显大汉帝国的武功军威，汉武帝在原体屠王领地置武威郡，至今已有 2000 多年历史。武威二字彰显着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度，如同踏着飞燕疾驰的骏马，气宇轩昂、磊落潇洒。武威古称凉州，意为寒凉之地。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大凉都曾在此建都。五凉时期，中原战乱频仍，而“天下丧乱，凉州独全”，保存和传承了中原文化，对隋唐及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凉州”，单单这两个字，就生出苍茫寥廓的意境。凉州曾是边塞诗歌浓墨重彩书写的地方，凉州词一度引领唐诗创作风尚。说到凉州词，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等诗句便会涌上每个中国人心头。如果唐诗是历史文化天空中璀璨的星系，那么凉州词就是闪烁在西北天幕穿越时光依然熠熠生辉的一颗星。《全唐诗》中为“凉州曲”填写的“凉州词”有百余首，凉州以其独特的魅力被无数锦心绣口的诗人吟咏传诵。

领略了马踏飞燕的风采，聆听了弘化公主的传说，再往西行便是张掖。张掖古称甘州，也是一个充满了诗意的地方。唐玄宗时教坊大曲有《甘州》，杂曲有《甘州子》，是唐边塞曲；宋词有词牌名《八声甘州》，简称《甘州》。甘州因城内甘泉遍地，泉水清澈甘甜而得名，甘肃首字“甘”便源于此。张掖古为西戎之地，后又历经氐羌、月氏、匈奴等部族统辖。汉武帝时期，为扫除边境困扰，收复河西地区，设置四郡，始称

张掖。张掖之名取“张国臂掖，以通西域”之意。1954 年，考古学者在张掖市山丹县城南发现了近千年前张掖先民的青铜像，其背部铸有大篆体字：扬扬张掖。这四个字何其豪迈，相隔千年时光依然能够使人清晰地感受到先辈张开双臂拥抱世界的情怀。隋炀帝曾在西巡途中，于张掖会见 27 国君主使臣，并在此举办规模宏大的盛会。唐朝时，河西走廊地区贸易往来达到高峰，位于中段的张掖更是成为一颗闪耀的丝路明珠。

“不望祁连山顶雪，错把张掖当江南”，离开塞上江南张掖，沿着河西走廊一路向西，就会来到城下有泉、其水若酒的酒泉。

酒泉古称肃州，寓“肃靖宁边”之意，甘肃即为甘州与肃州的首字合称。相传在西汉时，汉武帝派骠骑大将军霍去病率领 20 万大军，过焉支山，出征匈奴，大获全胜。捷报传到长安，汉武帝大悦，犒赏三军并赐霍去病御酒一坛。然而，酒少人多，霍将军不忍独饮，他传令三军在潺潺流淌的清泉边聚齐，然后把酒倒入泉中，众将士在泉边开怀畅饮。此地因而名为酒泉。

西汉所设四郡中，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东汉应劭注《汉书》时释“敦煌”为“敦，大也。煌，盛也”。唐李吉甫编纂《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敦，大也。以其开广西域，故以盛名。”在中外学者的研究中，关于敦煌之名的考据，涉及在西北居住过的所有民族，敦煌二字中留下了众多民族语言交融的痕迹。出敦煌城向南是连绵起伏的鸣沙山和被鸣沙山环抱的月牙泉。在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开凿的莫高窟，以 735 个洞窟、4.5 万平方米壁画构筑起人类盛大的艺术殿堂，在茫茫的

戈壁上矗立千年。

除了久负盛名的河西四郡，还有一个地方令人神往，在陇中苍茫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交汇处，坐落着一座镌刻着边塞风云的古城——定西。那是一个独具魅力的地方，也是我梦魂萦绕的故乡。北宋元丰年间，宋神宗赵顼将收复的西夏故地赐名定西，自此，“安定西边”四个字便成为铮铮誓言，在战鼓与驼铃声中回荡千年。元末地震震撼山河，定西曾易名“安定州”祈求安宁。如今定西之名得以沿用，而定西市只有一个区，就是安定区。定西各县之名也都历史悠久。通渭县之名源自宋朝将士在渭州古道上筑起的“通渭堡”；陇西县因在巍巍陇山以西而得名，秦昭王在此设郡，飞将军李广留下千古威名；临洮县意为“临近洮水”，王昌龄曾有“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之句……

甘肃大地上还有无数古朴厚重的地名，其中有千年不断的传承，文王伐密筑灵台，轩辕问道于崆峒；有开疆拓土的气概，平定梁国的平凉；有守卫疆土的勇气，嘉峪关、玉门关、阳关、雄关万里；有历史与诗情的熔铸，天河注水的天水，瓜果飘香的瓜州；有国泰民安的祝福，愿景泰、长安宁……

甘肃如同一部书写千年的典籍，在漫长的岁月中静静地翻开扉页，等待知音来阅读，读懂秦汉长城的烽燧记忆、五凉文化的清音雅韵、千年敦煌的盛大辉煌，读懂华夏文明的浩瀚沧桑与历史底蕴。



母亲

潘玉毅



相比于对读闲书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母亲在重要的事情上家教是很严格的。我小学是在村里读的，学校很小，没多少学生。我们那届人数最多，也才二十五个人。或许因为这个缘故，考卷内容更新得也不勤，有些卷子前几年考过，过了好几届，月度考试题仍有很高的重合度。一些要小聪明的同学为考一个好分数，便将学长们的试卷借来，提前背熟。其实这跟作弊没什么两样，本来我是不屑干的，后来发现一些成绩不如我的同学用这种办法考得比我还好，于是没经住诱惑，竟也动了歪心思。

相较于其他同学，我用旧试卷更有“优势”，因为我哥只比我年长两岁，所以根本不用去借。那时候我的记性极好，一张试卷上的题目只要几分钟就能记得住大概。某天，我鬼鬼祟祟地爬上三楼，从编织袋里翻出我哥的试卷，因为心虚不敢光明正大地看，而是偷偷取来，在书包里藏了一张卷子，剩下的试卷通通塞到被褥底下，打算放学后回来看。但等到放学，还没进门，我就看到母亲黑着脸。

寻常时候，因为我哥比我调皮，母亲“杀鸡儆猴”，向来以揍我哥为主，但那天是个例外，为了让我“长记性”，她是真下狠手啊。除了肉体上的疼痛，我依稀记得母亲还说了很重的话。大意是训斥我弄虚作假，要考高分就要凭实力，不可以耍小把戏，骗自己、骗别人。我听着惭愧，还有些懊恼，主动把书包里藏着的那张卷子也拿了出来，再三保证自己以后一定不再犯错，母亲这才面色稍缓。可能是怕

自己下手重了，她问我痛不痛。怎么可能不痛？结果我一慌乱却摇了摇头。母亲没好气地说：看来打得还不够重。说完，作势要打，把我吓得往后一躲。这件事的严厉处置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的画面感记忆犹新。

小时候我和哥哥若是犯了原则性错误，母亲绝不姑息。待我们长大成年后，方感受到这种教育的好处，育人如同种树，小树不修枝，长大说不准就长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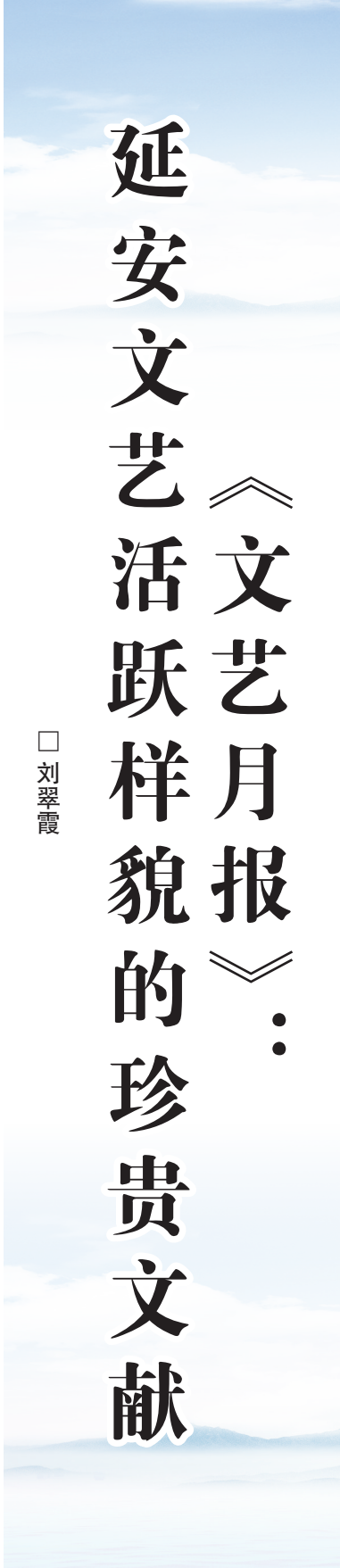
母亲处事有自己的原则，似乎很严厉，实际上在她坚强的外表下有一颗宽容而柔软的心。从前在老家的时候，邻里常因一些小利发生纷争，田埂占你一截，石子扔你地界，类似的事情时有发生。每次遇到不平之事，母亲都会据理力争，甚至强硬地回击。但她很快就会忘记别人的不好，只要别人一说好话，就轻易地选择了原谅。甚至别人都没道歉，她一念及别人曾经释放的善意，心就开始变得柔软。

母亲的言行如春风化雨，在岁月流转间为我织就人生经纬。成年后的我离家在外读书、工作，这些年也遇到不少波折，可无论何种境遇，我始终记得母亲的教诲。在教育儿女方面也深受母亲的影响，以期用从小严格的教育让她的未来受益；在与人交往中也努力学会宽容，以真诚豁达获得生活的安心顺心。



延安文艺活跃样貌的珍贵文献

刘翠霞



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文献中心的二层，陈列着一套《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丛书。这套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历时五年整理的文献，系统、完整呈现了延安时期党政机关、文艺团体的出版物原貌，其中的《文艺月报》分册吸引了我的目光。1941 年是延安文艺活动较为活跃的一年，一大批文艺团体和报刊如雨后天春笋般涌现，1941 年 1 月创刊的《文艺月报》虽然办刊时间并不长，目前能找到的也仅有 17 期（至 1942 年 9 月），但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迹。

1940 年，萧军等人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后，与丁玲共同创建了文艺月会，次年推出机关刊物《文艺月报》，由丁玲、舒群、萧军轮流主编。《文艺月报》的创刊号刊发了丁玲、舒群、萧军的《简记文艺月会》，何其芳的《对于〈月报〉的一点意见》，荒煤的《第一声呼喊》，丁玲的《大度、宽容与文艺月报》等文章。其中荒煤的文章有较为鲜明的革命动员员色彩，与丁玲的《大度、宽容与文艺月报》形成呼应，丁玲强调“大度、宽容”，荒煤则侧重“第一声呼喊”的战斗性，二者共同构建了《文艺月报》“兼容并蓄，服务革命”的办刊宗旨。荒煤在文中提出，延安被认为是“一个坚强的文艺堡垒”，如果文艺月会是以文艺创作和批评充实延安文艺堡垒的先锋队，那么《文艺月报》就是这个“文艺堡垒的号筒”。丁玲也强调“《文艺月报》要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把握斗争的原则”，内容方面要多样化，要有鲜明的特色，而“不要使《文艺月报》成为一个没有明确的主张、温吞水的拖拖沓沓的可有可无的、没有生气的东西”。

正是在这样的办刊理念指导下，《文艺月报》基本上遵循着“文艺为抗战服务”这一主旋律，刊登了大量与抗战相关的作品。其中艾青的诗歌比较有代表性。刊登在第五期的《三国公约》，是一首有较强批判意味的诗歌，艾青通过诗歌表达了对国际法西斯势力扩张以及部分不觉醒汉奸的批判，并呼吁民众团结起来抵抗侵略：“但中国人民不愿意自己消亡/用暴怒的反抗击碎侵略者的梦。”刊载在第四期的《太阳的话》，艾青以其积极乐观的笔触，借太阳这一意象抒发了爱国情怀，诗中“打开窗子”“撒满光明”等语句，象征打破旧中国的封闭与黑暗，迎接民主与自由的新生活，表达了对抗战必胜的美好憧憬。此外，第七期刊登的鲁迅的《骨肉——一个伤员语录》、陶铸的《我们的日子》，第十期刊登的冯牧的《欢乐的诗和斗争的诗——对于我们诗底创作的几种现象底感想》、萧军的《敬致：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聂斐的《迫害》，第十七期韦明的《于一次“焚毁”底战斗中》等不同体裁的文章，或是倡导将文艺作为战斗的武器，或是通过描写战争的残酷表达对战争的批判，或是以戏剧形式再现沦陷区的苦难，强化文艺的救亡功能，从不同角度体现了《文艺月报》作为“文艺堡垒的号筒”功能。

《文艺月报》很注重对青年作者的挖掘和培养。在《文艺月报》创办后不久，文艺月会又发起创办了名为星期文艺学园的业余文艺补习班。《文艺月报》第四期刊登的《拟创办星期〈文艺学园〉座谈会要纪》简要介绍了创办星期文艺学园的宗旨就是帮助文艺青年学习写作：使一些对文艺有兴趣学习与写作的人，有一个研究的机会。第五期接着又刊登了雪韦撰写的《关于“延安星期文艺学园”的产生》一文，详细阐述了《文艺月报》的主编们想借助星期文艺学园培养青年文艺爱好者的强烈愿望。文章指出，在延安除了“鲁艺”文学系的一些同学，社会上还有许多喜欢文艺的青年是“苦”的，因为他们看不到什么文学书，也没有多少文学报刊可看，更没有相关的文艺活动可以参加。热爱文学的青年们即使写出作品也找不到人帮助修改，他们想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但苦于无门。因此开办一些“业余”的补习班就是必要的“补救”，如此就可以让那些青年们利用周日的学习时间、提高自己。雪韦还提了几点愿望：希望工作人员能够“持久不疲”“努力工作”“任劳任怨”；希望青年学员能够“贯彻始终学习”“不因小故而抛弃或中断学习”；希望文学界的同志们能够“发扬团结友爱的作风”“为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文学事业——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事业而再加珍重”。

除了几次刊登文章介绍延安星期文艺学园相关情况，《文艺月报》还为文学青年发表作品提供了平台。第六期的《文艺月报》大篇幅推出了“我与文学专页（星期文艺学园选辑）”，刊登了青年作者晋驼的《人间最高尚的趣味》、赵文藻的《我要赞美，也要学习》、杨枫的《向我所爱的人群呼唤》等五篇文章。罗烽在《“专页”及其他》一文中指出，这五篇文章是从一百二十多个青年学员的试卷中选出来的，但并不是择其优者选用，而是因为这些文章是独特的存在，透过这些文章能够让大家看到爱好文学的青年们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中认识文学、与文学产生密切的关系。并且强调发表这五篇文章的目的是想让人们更好理解文学对于人生的价值，并能够把握住文学这一有力的武器，破旧立新，“给新中国的新文学的历史上，刻铸下辉煌的业绩”，可谓对青年作者寄予厚望。第十六期更是推出了“延安星期文艺学园结束纪念特辑”，除了刊登第一期四十多位学员的名单，还刊登了萧军撰写的《献辞——为延安星期文艺学园一年修业期满》和高阳撰写的《我反省——星期文艺学园结束时我所要讲的话》，以及十多位学员代表的学习体会。可以看出，经过一年的业余学习，学员们的思想觉悟、文艺知识和写作能力都有明显提升，星期文艺学园为延安文艺界培养了一批青年作家，而《文艺月报》就是这些青年作家成长的摇篮。

仅仅创办了十几期的《文艺月报》，不仅是左翼作家重要的创作、批评阵地，还是各行各业的文艺创作者、爱好者交流争鸣、了解文艺动向的园地。《文艺月报》刊发的一百二十多篇文章中，题材多样、类型丰富，除了小说、诗歌、剧本、译文以外，涉及文艺工作的座谈会、评论、总结以及文艺争鸣的就有四十多篇。可以说，《文艺月报》是当时延安文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个缩影，为今天学者研究活跃的延安文艺样貌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